

主体的倒影

历史巨变的
精神图景

倪伟 著

博雅

博雅文学论丛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主体的倒影

历史巨变的 精神图景

倪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主体的倒影：历史巨变的精神图景/倪伟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10

(博雅文学论丛)

ISBN 978-7-301-30850-9

I. ①主… II. ①倪…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史研究—文集②中国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9.53②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15104 号

- | | |
|-------|--|
| 书 名 | 主体的倒影：历史巨变的精神图景
ZHUTI DE DAOYING: LISHI JUBIAN DE JINGSHEN TUJING |
| 著作责任者 | 倪 伟 著 |
| 责任编辑 | 艾 英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30850-9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pkuwsz@126.com |
| 电 话 |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编辑部 010-62756467 |
| 印刷者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21.5 印张 353 千字 |
| | 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65.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作者简介

倪伟，1968年生，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及当代文化。出版专著《“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文学政策及文学运动》，译著《视觉文化研究》《漫长的革命》，在《文学评论》等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

目 录

一 个人认同的困惑与抉择

《新青年》时期钱玄同思想转变探因	3
霜魂悠悠	
——试论瞿秋白的精神历程和心灵悲剧	18
长天渺渺一征鸿	
——郁达夫论	29
笑涡里的泪	
——谈梁遇春	39
胡风在 1949 年	54

二 语言、文体与主体的规划

清末语言文字改革运动中的“言文一致”论	77
章士钊的“逻辑文”与欧化的古文的限度	100
小品文与周作人的启蒙“胜业”	121
朦胧诗的旧魂新魄	133

三 历史裂变中主体身份的漂移

情色想象的政治：中国内地文学中的香港	145
农村社会的变革与文学叙事	
——社会历史视野中的新时期农村题材小说	162
农村社会变革的隐痛	
——论张炜早期小说	189
平凡的超越：路遥与 1980 年代文化征候	205

鲜血梅花: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叙述	232
“布”的分析	
——格非《欲望的旗帜》的一种解读	244
弱者的反抗与主奴辩证法	
——评王祥夫的《雇工歌谣》	254
讲述“外地人”的尴尬	
——评荆永鸣的“外地人”小说	263
镜中之蝶	
——论“70后”的城市“另类”写作	271

四 视觉主体与视觉体制

视觉文化、现代性与中国经验	293
商品镜阵中的女性身体	
——论“月份牌”女郎	300
社会主义文化的视觉再现	
——“户县农民画”再释读	309
“新山水画”与社会主义中国的视觉体制	320
后 记	339

—

个人认同的困惑与抉择

《新青年》时期钱玄同思想转变探因

自1908年问学于章太炎后,钱玄同就成了一个头脑“比太炎先生还要顽固得多”的复古分子,不仅主张推翻清政府以恢复汉族的文物制度,而且还认为应越过明朝和汉唐,“复于三代”。^①他狂热地践行复古的主张,用小篆书写,行古代礼制,民初在浙江教育司供职时,还设计制作了一套深衣玄冠,穿戴着上班。^②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刚一发表,他却出乎意料地迅速响应,致书陈独秀,力挺文艺改良之议,并痛斥“选学”为妖孽、“桐城”是谬种。^③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高足,钱玄同的反戈一击让陈独秀和胡适喜出望外。陈独秀恭维他:“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④尚在北美留学的胡适更是感到“受宠若惊”。^⑤钱玄同从此变得十分活跃,不断在《新青年》“通信”栏发表长信,攻击包括古文、旧戏、儒道释乃至汉字在内的一切国粹,言辞之激烈令人侧目,他也借此一跃成为《新青年》同人中举足轻重的人物。^⑥

钱玄同何以会从狂热的国粹主义转到全盘反传统的立场上?钱玄同自述是因受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刺激:“自洪宪纪元,始如一个响霹雳震醒迷

① 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之变迁》,《钱玄同文集》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3页。

② 同上书,第117页。

③ 钱玄同:《赞文艺改良附论中国文学之分期》,《钱玄同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页。

④ 陈独秀:《答钱玄同》,《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6页。原载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6号。

⑤ 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第1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11页。

⑥ 在林纾的影射小说《荆生》中,浙人金心异(即钱玄同)与皖人田其美(陈独秀)、狄莫(胡适)三人放言欲力掙孔子,却为“伟丈夫”荆生所殴。钱与陈、胡二人并列,足见其影响之大。周作人认为《新青年》“毁灭古旧的偶像”的论调虽由胡适之、陈独秀首倡,但钱玄同“继之而起,最为激烈,有青出于蓝之概”。见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2卷第94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94页。

梦,始知国粹之万不可保存……”^①对这种说法很多人都深信不疑。周作人晚年谈到钱玄同,也认为是“民国初年的政教反动的空气”促使其转向了反复古。1915年的洪宪帝制和1917年的张勋复辟,“这两件事情的轰击”,使得“所有复古的空气乃全然归于消灭,结果发生了反复古”。^②但事情似乎并不那么简单。

1914年9月28日,袁世凯率百官祭孔,意在为复辟帝制预演。钱玄同对此意兴甚浓,不仅索取了一本祭祀冠服图,还在日记中称“所定斟酌古今,虽未尽善,而较之用欧洲大礼服而犹愈乎!”^③对袁氏遵行古礼似不无赞赏之意。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劝进正式登基,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令人意外的是钱玄同日记中并无关于此事的记载。1916年元旦那天,钱玄同在马幼渔处见到官报,“乃知自今日始改称中华帝国洪宪元年,是民国历数尽于昨日”。下午他照常游玩中央公园并参观古物陈列所,晚上点阅廖平的《群经凡例》。^④当天的日记语气平静,看不出他有多么愤怒。此后三天的日记均是读经论古,无一字提及袁氏称帝。1月5日日记中他又重弹用孔子纪年的老调,嘲笑“光复以后,浅人皆用民国前几年……至今则民国已成前代,吾不知彼等又将创为何种纪年?将曰帝国前几年乎?则自黄帝以迄清宣统四千余年中间,惟周称王,余悉帝国也。将称洪宪前几年乎?则洪宪之名,正如明之洪武,清之顺治,及日本之明治……”^⑤言语中既无亡民国的哀痛,亦无对袁氏倒行逆施的愤怒。

读他当时的日记,的确感受不到袁氏复辟给他的刺激有多么强烈。印象更深的倒是他因个人生活不顺而不断发出的怨叹。1913年9月,他就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地理部及附属中学国文、经学教员,本想等来年秋天“收入稍丰”,接家眷来京,“不料为忌者排挤”,“所入不及百金”。同门马幼渔遂将自己的中学课程相让,但这样钱玄同每周的课时量就达到

① 钱玄同:《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281页。在1919年1月1日的日记中,钱玄同回顾说:“因为袁世凯造反做皇帝,并且议甚么郊庙的制度,于是复古思想为之大变”,“于是渐渐主张白话作文”,又“始知孔氏之道断断不适用二十世纪共和时代,而废汉文等等思想发生”。见《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36—337页。

② 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2卷第94辑,第93页。

③ 《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第275页。

④ 同上书,第282页。

⑤ 同上书,第283—284页。

了19小时。^①1915年后,他又兼任北京大学文字学教授,课时量更增加到每周27小时。^②几乎每天都要上四五个小时的课,自然是劳顿不堪,他日记中便常有“甚惫”或“惫甚”的感叹。更不幸的是,家眷北来之后,病患不断,大人、孩子均先后染上白喉、猩红热等时疫,四子秉东夭折。在1917年1月8日日记中,他哀叹:“三月以来,心绪恶劣,至今尤不许我开展,且我自身亦难保此后竟不传染,思至此,愈觉闷闷不乐。”^③没过几天,他家中又发生煤气中毒,“家中上下,人人患病”,三子秉弘和一女仆“人事不知,几濒于死”。^④阖家诸般不顺,他心绪之恶劣可想而知。在1917年1月的日记中,他不断说些“人极无憀”(1月1日、23日、25日)或“余极无聊”(1月11日)之类的话,甚至对于平时所喜爱的逛厂甸这等乐事也“殊无兴趣”。^⑤在1月13日的日记中他更声称“入都以后,心绪恶劣者三年”^⑥。然而,正是在最感侘傺无憀的时候,他却突然爆发了,在1917年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发表了火力十足的第一篇“通信”。因为生活不顺利而淤积的愤懑和怨怼,似乎全都借此得到了宣泄。

转宗今文经学

钱玄同激烈地反传统当然不可能只是为了消个人胸中块垒,态度的转变必定有着内在的思想动因。读他1914年后的日记,不难发现其间的草蛇灰线。

1914年2月,钱玄同尊今文经学大师崔适为师,“以札问安”,自称“弟子”。^⑦崔适的《春秋复始》、廖平的《群经凡例》等今文经学家的著作从此成为他日常研读的案头书。章太炎专宗古文,钱玄同却“‘背师’而宗今文家言”^⑧,其间暗含着什么消息呢?今文经学尊今抑古,探求先圣之微言大

① 《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第273页。

② 同上书,第299页。

③ 同上书,第300页。

④ 同上书,第301页。

⑤ 同上书,第305页。

⑥ 同上书,第301页。

⑦ 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方国瑜标点本〈新学伪经考〉序)》,《钱玄同文集》第4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4页。

⑧ 钱玄同:《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书》,《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225页。

义,强调要经世致用,至廖平、康有为辈出,遂有孔子托古改制之说,这对于长期受经义束缚的中国读书人来说不啻是一种思想解放。今文经学家通过考据辨伪疑古的手段,对钱玄同震动极大,他自此笃信古文经乃为刘歆伪造。连千百年来士人奉若神明的古文经也因有作伪迹象而变得不可信,那“史”“子”“集”中的书就更不可信了。既然传统典籍皆不足征信,那么载于典册的古代思想和礼法当然也都不足信了。“古”已不真,还怎么复古呢?今文经学的辨伪之学因而从根本上动摇了钱玄同复古思想的根基。1917年后,钱玄同思想更趋激进,不仅视一切古文经为伪造,还进而“打破‘家法’观念,觉得‘今文家言’什九都不足信”^①。此时适逢《新青年》举起反传统的旗帜,风云际会,他也便因疑古而转向了激烈的反传统。

美国汉学家艾尔曼在其关于清代常州今文学派的研究中指出:在中华帝国晚期,“经学研究被作为一种系统化的政治话语,成为一种为国家特权合法性辩护的具有意识形态封闭性、排他性的系统”^②,而今文经学则“代表着一个充满政治、社会、经济动乱的时代的新信仰,它倡导经世致用和必要的变革”,今文经学家们“求助于古典的重构来为现代授权,为将来立法”^③。在此意义上,今文经学与其说是一套学术话语,不如说是在中华帝国晚期危机深重的时刻应运而生的一套新的政治话语,尽管它仍须以经学研究的面目出现,以谋求一种政治合法性。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刘逢禄,以及后来的魏源、龚自珍和康有为,都十分强调经学经世致用的性质,对于他们来说,经学首先是可以用来变革社会的政治工具,而不是考据、辨伪之学。康有为提出“托古改制”的口号,更明确地表达了藉经学以变法的意图。钱玄同对今文经学的这一精神传统似乎缺乏认识,他对今文经学的兴趣几乎完全是知识性和学术性的。他非常推崇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赞其考证、辨伪的功夫都极精审,采用的正是“科学的方法”。^④至于颇受非议的康有为“托古改制”的经说,他以为应与考证“分别评价”,《新学伪经考》在考证学上的价值,决不会因经说之是非而有增损。在他看来,“今文古文之不同,最重要

① 钱玄同:《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书》,《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225页。

② [美]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3页。

③ 同上书,第225页。

④ 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方国瑜标点本〈新学伪经考〉序)》,《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138页。

的是篇卷之多少,次则文字之差异;至于经说,虽有种种异义,其实是不值得注意的”^①。重考辨而轻经说,对今文经学家立论的方式及背后的问题意识更不加措意,这恰恰暴露了他思想上的短视:只能见其表而不能究其里。他一生思想多变,屡次翻转立场,即缘于这种缺乏思想根基的短视。

今文经学对古经的辨伪仍然是在儒学的政治框架内进行的,希望通过对经典的批判性清理和重构来激发儒家传统思想所固有的政治活力。今文经学家们始终相信儒家思想即使在当代社会中也仍然有着经世致用的价值。“对他们来说,儒学仍是新的信仰和政治行为模式的起点和无庸质疑的内容。”^②今文经学对古经的辨伪与对儒学思想的全盘质疑完全是两回事,承认古文经有伪造的痕迹,决不等于说它们所阐述的儒家学说本身也因而丧失了其全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然而钱玄同的逻辑却是:既然“经”是伪造的,那么“‘经’这样东西压根儿就是没有的,‘经’既没有,则所谓‘微言大义’也者自然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③。他据此认为“‘六经’的大部分固无信史的价值,亦无哲理和政论的价值”^④。这种逻辑放在今天来看,自然是荒谬的,但在当时却的确为他转向全盘的非孔和反传统提供了知识的和思想的依据。

没有根基的无政府主义

在转宗今文经学后,钱玄同又对无政府主义重新产生了兴趣。早在东京求学时,他就曾受张继、刘师培的影响,一度信奉无政府主义,多次参加刘、张二人创办的社会主义讲习会。他曾与人激辩无政府主义有无实行之可能,认为断言无政府主义决不能实行,盖因误以为“无政府时代之制与今制同”^⑤。换句话说,就是决不能以今天的情势来推断将来,否定未来之可能性。他后来说服鲁迅起而呐喊,靠的也是这一逻辑。鲁迅认定“铁屋子”万难破毁,启蒙者的呼喊只能使少数被惊醒的人忍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

① 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方国瑜标点本〈新学伪经考〉序)》,《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211页。

② [美]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第226页。

③ 钱玄同:《〈春秋〉与孔子》,《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261页。

④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238页。

⑤ 《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第117页。

楚”，钱玄同却相信既然有几个人起来，就不能说决无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

在东京的时候，钱玄同尽管对当时无政府主义的两大重镇《新世纪》和《天义报》都有所不满^①，但还是非常热心地阅读无政府主义的报刊。他对《新世纪》也不乏赞誉，认为它“打破阶级社会，破坏一切，固亦大有识见”^②；“要之大辘椎轮，于现今黑暗世界中不得谓非一线之光明也”^③。无政府主义吸引他的究竟是什么？首先是无政府主义“排斥强权”的主张。他认为晚清以来国人崇拜功利之心日炽，认强权为文明，提倡无政府主义则能破此劣根性。^④他在1908年2月23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刘师培在社会主义讲习会上的发言，刘批评了当时国内盛行的立宪论，嘲讽“功利主义之《天演论》几为家弦户诵之教科书。凡编教科书者皆以富强功利等说为主干”，无政府主义则正能“药其毒”。^⑤他赞同刘师培的这一说法。其次是无政府主义的平等观。在他看来，无政府主义主张“人人平等，人人受同等之教育”，可以弥补因体格强弱和受教育程度差异而产生的不平等。^⑥再次是无政府主义的非功利的自我观。1908年2月28日的日记记载了他伦理课考试的答题内容：个人“对于身体之义务无他，即求学以改良社会，使人道进化，非为祖国、功名利禄、一己之私等”，“今之伦理学，皆偏重个人（自私自利）、国家（强权功利）伦理，此极不然（反于进化）”。个人的自私自利和帝国主义的兴起其实有着内在一致的逻辑，“有自私自利心，而帝国主义乃兴”。“二十世纪之时代宜求社会的平民教育，如孔、孟之徒应排斥务尽，以绝忠君爱国之念。”尽管这些观点“皆捡《新世纪》之唾余”，“尚非尽善”^⑦，但他基本上还是认同的。上述三条，无论是非功利、反强权，还是人人平等、自我进化、趋于完善，其实都能在章太炎的思想中找到相应的论述。《五无

① 他认为《新世纪》那群人“学识太浅，而东方之学尤所未悉，故总有不衷于事实之处”（《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第106页），且“每有不轨于理之言”（同上书，第105页）。他更不能接受《新世纪》所提出的废除汉字、推广万国新语（世界语）的主张。他虽然佩服刘师培“中国学问深邃”，但对刘“总主张进步说，因甚以《新世纪》为是，又谓世界语言必可统一云云”也颇为不满，认为其实在“难化”（同上书，第134页）。

② 《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第105页。

③ 同上书，第106页。

④ 同上书，第114、116页。

⑤ 同上书，第117页。

⑥ 同上。

⑦ 同上书，第118—119页。

论》《四惑论》《国家论》诸篇就阐发了无国家、有种族、非功利、否进化等观点,它们与无政府主义的确有着诸多相合之处。既然太炎先生的思想已大体包含有无政府主义的一些令人心动的议题,钱玄同自然就无需旁求了。这可能是他在1909年后不再谈论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原因所在,而未必如其所言,是因为刘师培回国降了端方^①。

大约在1916年秋天,钱玄同又突然对无政府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9月18日他“收到区佩刚寄来 Anar 之文印刷小册四种”,第二天又“寄书上海,购 Anarhismo 书报数种”。9月20日,他购墨盒一,上镌“玄同”二字^②,自此启用“钱玄同”之名。回到无政府主义,这和他复古思想的破灭直接相关。他在1917年1月11日日记中说:自己“自受洪宪天子之教训以来,弃保存国粹之心理已有大半年矣。今日思之,《新世纪》之报,即为吾国言 Anarhismo 之元祖,且其主张新真理,针砭旧恶俗,实为一极有价值之报”^③。他托蔡元培搜购《新世纪》旧刊,就是想从中寻找新的资源,以填补国粹主义破灭后的思想空虚。1916年10月4日的日记记载了他关于“毁家”的思考:“吾谓苟不毁家,人世快乐必不能遂,若谓毁家之后即视父母兄弟如路人,则尤为谬见,破坏家族正是兼爱之故,方欲不独亲其亲,子其子……”^④这完全是复述了《新世纪》关于家庭革命的观点。^⑤

事实上,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激进言论基本都没有越出《新世纪》当年所讨论的议题。作为音韵文字学专家,他最关注的当然还是语言文字问题。他认为中国文字乃是“象形文字之末流,不足与欧西诸国之拼音文字立于同等之地位”,“断非新时代所适用”^⑥,因此主张废汉文而用世

① 在1917年9月12日的日记中,钱玄同称:刘师培归降,留日学生中的同盟会员皆以此为口实而诋毁无政府主义,他遂因此“亦渐渐不谈”无政府主义。《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第315页。

② 《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第291页。

③ 同上书,第300页。

④ 同上书,第293页。

⑤ 褚民谊在《普及革命》(《新世纪》第15、17、18、20、23期连载)一文中指出:“亲疏由于有家族,家族由于有男女配合而成,故欲破亲疏之习惯,必自破家族始。欲破家族,必自废婚姻始。婚姻既废,家族不得成,始人各无自私自利心。无亲无疏,互相扶助,四海一家,天下大同,无君臣、父子、夫妇、昆弟之别,只有朋友之爱,爱以是为博。”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第1038页。

⑥ 钱玄同:《答陶履恭论 Esperanto》,《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99页。

界语。这是照搬了吴稚晖等人在《新世纪》上所发表的采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的言论。当年章太炎对《新世纪》认汉字为“野蛮之符号”一说曾大加痛诋,作《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力辩汉字之优长,并强调语言文字关乎历史文化遗产,若盲目崇拜欧洲,欲废本国文字“以逐文明”,则会适得其反,“得其最野者”。^①在这场笔仗中,钱玄同当然是站在老师这边的。他在1908年4月28日日记中说:《新世纪》“复有创中国新语者,其编造之字身、句身,以知字能识万国新语为目的”,此举不仅可笑,实乃发疯。^②在9月27日日记中,还大骂奏请废汉文、用“通字”的法部主事江某以及提倡用简体字的王照等为“王八蛋”。^③1910年,钱玄同协助章太炎创办《教育今语杂志》时,更明确宣称:“夫文字者,国民之表旗,此而拨弃,是自亡其国也。”^④然而想不到的是,没过几年,他的态度就来了一个彻底的翻转,宣称“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⑤昔日视汉文为民族文化精魂所在,今则视之如毒瘤,必欲去之而后快,只因他对汉文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既然汉文过去之历史,“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⑥,那么要铲除孔教、道教的妖言,最彻底的解决办法就是将其载体——汉字一并连根拔去。

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全盘否定是钱玄同主张废汉文的思想前提。他认为,“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经”是“教忠教孝之书”,“史”“不是大民贼的家谱,就是小民贼杀人放火的账簿”,“子”和“集”“大多数都是些‘王道圣功’、‘文以载道’的妄谈”。^⑦总之,两千年的中国思想传统宣扬的不是“奴隶道德”就是“野蛮思想”,只能令人发昏。然而,他的全盘反传统却基本只停留在笼统而又僵硬的立场上,没有对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些基本的思想命题或价值准则作深入的批判性分析,所以其激进言论虽然有助于扩大新文化运动的

① 《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69页。

② 《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第130页。

③ 同上书,第141页。

④ 钱玄同:《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之缘起》,《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313页。

⑤ 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166—167页。

⑥ 同上书,第166页。

⑦ 同上书,第163页。

影响,但在思想文化的推进方面却鲜有建设性的成绩。同样是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陈独秀的思想出发点不是无政府主义,他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全盘性批判,是在个人主义的伦理观与民族主义目标的张力中展开的,这种批判始终和他的政治革命理想联系在一起,并且最终从文化批判走向了政治行动。在鲁迅那里,这种个人主义伦理观与民族主义目标的张力同样也是存在的,只不过他不像陈独秀那样深信单单依靠政治革命就能从根本上改造社会。鲁迅对传统的看法无疑是更为复杂、更为幽暗的。

和陈独秀、鲁迅相比,钱玄同的反传统言论由于没有深刻的思想根基,不免有点肤浅,在思想的深度和论述的水平上都没能超越十年前的《新世纪》派。鲁迅曾评价钱玄同的文章“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①。所谓“少含蓄”,根本是缘于思虑不深,或者观点竟非己出,只满足于表明立场,却不能看到问题对象的复杂性。

鲁迅的影响

在《呐喊·自序》里,鲁迅生动地记录了钱玄同为《新青年》向他约稿的情景,并委婉地表达了他们对启蒙事业的不同看法。在东京时两人同在章太炎门下,后来在北京亦不乏见面的机会,但多数是师门聚会^②,私下交往并不多^③。1917年8月9日,钱玄同访鲁迅和周作人不值,下午又再次前往周氏兄弟借居的绍兴会馆,和他们一直谈到深夜十一点。^④此后钱玄同开始频繁登门拜访,且每次必谈到深夜十一点后始去。这种频繁的交往一直

① 鲁迅:《两地书·一二》,《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7页。

② 钱玄同在1915年1月31日、2月14日日记中均提到章门宴师会,这两次聚会鲁迅都参加了。见《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第279、281页。

③ 查鲁迅日记,在1917年8月以前,他与钱玄同见面次数不多,多是在朋友家偶遇或是朋友聚餐时碰见,偶尔也有书信往来。分别见1914年1月31日、6月13日、9月27日、12月31日以及1915年2月14日、3月8日、4月10日、6月20日、6月24日日记。另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和钱玄同在张勋复辟前“相见只有关于师友的事情可谈,否则骂一般士大夫的不通,没有多大兴趣,来往因此不多”。见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53页。

④ 周作人此日日记载:“钱玄同君来访,不值。仍服规那丸。下午,钱君又来。留饭,剧谈至晚十一时去。夜颇热。”见《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686页。